

# 萧大亨评传(下)

周 郢

## (三)在党争中沉浮

激烈的党争,是万历朝的又一大政治积弊。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机构相互制约来增重皇权的,随之而造成诸臣之间勾结与争斗,渐成门户。及至晚明,门户日多,争斗益炽。明末夏允彝在《幸存录》中指出:“自(郑)贵妃宠盛,上渐倦勤,御朝日稀,迨国本之论起,而朋党以分,朝堂水火矣。”此种情形肇始于万历中期,此后围绕国本、察典、矿税、妖书、楚宗、三案诸问题,门户倾轧愈演愈烈,自后妃、诸王、内监、外戚、阁臣、九卿、言官、外吏以至乡宦、文士,无不卷及门户之争,直至明亡而余波未息。身为枢庭巨卿的萧大亨,便身不由己地陷入这股党争浊流之中。

早在“洮河之变”时,萧大亨便因支持首辅申时行的款贡之议,受到激进的主战派官员之激烈批评,先是万历十八年(1590)九月,巡按直隶御史张鹤鸣弹劾萧大亨拒停对蒙古之市赏,“仍令互市易马,损威褻惠,取轻外夷”(《神宗实录》卷三二七)。其劾议被神宗否决后,萧大亨始得继续执行其款贡战略。但直到鞑靼擒献叛酋,边域底定,言官们的围攻仍是接连不断。万历二十年(1592)十二月,御史姚思仁再劾萧大亨不令扯力克擒火落赤,只求缚史二塞责,而两年市赏全给之,明是媚敌卖国云云。此诚为以不可行之事而责人以不能。萧大亨被迫具疏剖辨,并求罢斥。此时言官的抨击,已带有明显的党同伐异色彩,以至被尊为元老重臣的大学士王家屏对此辈亦深致不满,而为萧大亨大鸣不平:“议者不深惟终始,猥欲以一偏之指挠之,诚如其(指姚思仁等)言,虏王不可使,史酋不可禽,安兔不可问。……乃朔方急,则倚公援而西;岛夷急,则倚公援而东,今九塞而犄角之,何尝有一隅不藉力于公也。而急则藉公之力以制变,缓则抑公之功以谀谗,公之心能无戚乎?”(《赠萧督府俘获叛酋蒙恩晋秩序》)

万历二十年(1592)后,王锡爵、沈一贯、朱赓等先后继任首揆,诸相与谏官及越职议论朝政的新进官僚矛盾日深。群臣建言,多攻击执政,两大阵营廷争不断。其中沈一贯、朱赓为首的浙籍官员,与新进派官僚的斗争尤为炽烈。史称:“党论渐兴,浙人与公论忤,由一贯始”(《明史》卷二一八《沈一贯传》)。萧大亨与王、沈、朱等内阁大僚在政治上都有很深的渊源,许多问题上休戚相关。故在其入朝伊始,便深陷于党争浊流,不能自拔。

与萧大亨颇有关联的党争事件,主要有以下数起,即:“东征”功罪、“释系囚”案、“妖书”之狱、乙巳“京察”、“冢宰”之争。

“东征”功罪:朝鲜抗倭历经七载,虽以奏捷告终,但关于此役功罪,明廷中却长期分呶不已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)正月,兵部主事丁应泰采不经之词,捏称朝鲜阴结日本,又劾总督邢玠以巨金赂倭退兵,诬称战胜,又言萧大亨等朋谋欺罔。

丁疏一上,引起朝鲜君臣的严重不安及征倭将吏之不满,为此萧大亨上本辩称:“丁应泰参臣不足惜,国家之大体当惜;督抚之功不必叙,将士之劳苦当叙。”(《国榷》卷七八)神宗深是其言,遂将丁疏寝置不下。

继丁应泰之后,督学御史李尧民、勘臣徐观澜又先后参劾沈一贯、萧大亨、邢玠、万世德为四凶,诬称其在东征中党和卖国,并查核各路败状,据实册报,对萧大亨予以强烈指责。

按诸其实,丁应泰、李尧民等所论诸臣隐瞒败状,并非向壁虚构,但若论朝鲜勾结日本,萧大亨、邢玠以重金买通日军退兵,东征之役为彻底之败仗,则不仅言过其实,而近于肆意污蔑。盖丁应泰等人不满内阁荐举萧大亨署理兵部及萧与邢玠同乡党比(见《神宗实录》卷三二六),故有意夸大萧大亨在军事指挥上的个别失误,而对征倭之功一笔抹煞,意欲以此罢去萧之兼署。种种苛论,其背后皆党争所使然。

“释系囚”案：释囚事件发生在万历三十年(1602)。是年闰二月，神宗重病缠身，自以为不久于世，便向首辅沈一贯下达遗命——“免矿税、释系囚、录建言”。然而次日神宗病情有所好转，又幡然悔悟，遣人传谕沈一贯：“矿税不可罢，释囚、录直臣惟卿所裁”(《明史·沈一贯传》)。其实后者也不过神宗羞于全部食言，故作姿态而已。时都御史温纯等皆“请即日奉行，颁示天下”。独刑部尚书萧大亨以为释囚事涉三法司，情形较为复杂，于是称：“弛狱囚，需再请。”——即认为开释罪囚之尺度及具体方案等，需详细请示后再作执行，因此与吏部尚书李戴皆未能及时将两事具奏。

当萧大亨对释系囚迟疑未发之际，激进的太仆寺卿南企仲按捺不住，上疏弹劾李戴与萧大亨，请亟罢二人，而敕吏、刑二部从速如诏奉行，其疏言词极为激烈，中论萧大亨云：“刑部被逮诸人，最干天地之和，一及宽政，奚啻更生，乃大亨若弗闻也者。臣途遇其属诸万里而问故，则曰：为讨保结。何尝有保结之说？尤可异者，大亨疏内称：应释放者释放。嗟乎！何尝释放一人耶？已奉旨而不遵行，甘蹈观望，未释放而称释放，真是欺罔！有斯二者，臣以为大亨当罢也。”(《神宗实录》卷三六八)

时神宗正因拒停矿税而同群臣产生对立情绪，见企仲疏，更加恚怒，顿尚气使性，传谕内阁：“南企仲不以君父为重，专思市恩，新旧建言奉旨降革诸臣都不准复职，因矿税干连人犯，刑部、镇抚司仍牢固监候，不许纵容。”同时命将南企仲贬官一级。

此谕之降，群臣无不感到突然，当萧大亨将请释系囚之疏捧至会极门时，宫门已拒绝接受。首辅沈一贯回奏圣谕，请求神宗“无因下之烦言，久留已降之德音”，而神宗不予理睬。

由于萧大亨迟疑不决，引起圣意反复，遂一时成为众矢之的。萧大亨亦深为此事愧疚不已，连连上疏，自作剖白，并望能挽回成命，补失于万一。其疏云：“自矿税以来，株连蔓引，殃及无辜。臣职任刑曹，目击诸苦，区区忧悯之心，不在企仲后。唯是臣遵奉敕谕，列款题知，在企仲或未知其详耳。”后文遂详列其事缘由及处置方案，最后并以覆奏不及时引咎自责，称“愿我皇上罢臣，仍将矿税干连人犯及建言诸臣特赐宽释，臣虽伏草野，实有余荣。”(《神宗实录》卷三六八)虽语殊沉痛，而神宗坚拒不纳，并令“勿再有陈请，以滋烦扰”。

释系囚案中，因萧大亨处置失宜，遂被一些大臣视为大有逢君之恶的嫌疑，后来次辅沈鲤在为温纯所撰墓志中云：“壬寅闰二月，上违和，忽罢矿税，下行取考之命，中外欣然。……而大司寇萧岳峰公独以出幽室再请。明日上体安，果收回成命，独私喜大司寇，而深怒奉行诸臣。”(《亦玉堂稿》卷十)于萧大亨语含讥刺，颇致不满。此事平心而论，萧氏明知君心难测，在紧急关头，不能当机立断，而是瞻笃靡定，过分注重细故，导致事有中变，从而失去了一个整顿积弊的契机，其行动远不及同僚温纯勇毅果敢，令人不胜遗憾！谓大亨处理事机谨慎有余，果断不足，此诚有之。但若据此谓大亨有意逢君之恶，却未必中的。盖释囚之议，原为五年前由萧大亨借殿灾陈言时率先提出(语在《在刑部任上》篇)，而此时系于刑狱的曹学程，又是大亨极力论救之人，至擅自为其除去死囚之列而受帝之切责。即争释囚于前，又于事后频频固请勿撤前旨，如存心逢君，断不为此屡摆逆鳞之举。而南企仲过于意气用事，不能冷静等待时机，对此事未能实施亦负有一定责任。

另一方面，这次围绕释囚而产生的轩然大波，乃与此时之派系斗争有关。时沈一贯等浙党势力渐次升涨，大为反对派所侧目。此次在废止矿税问题上，沈又未能据理力争，而是依违其间，更引起李三才等人对内阁的不满。故而南企仲等借弛狱、录直二事，向与浙党关系较深的萧大亨、李戴进行围攻，企图一举将二人免职，以翦浙党羽翼，更使此案背景日益复杂。《明史》所谓“党局即成，互相报复”，此亦其中一端也。

“妖书”之狱：万历二十九年(1601)首辅赵志皋卒，由沈一贯独当阁务。万历三十一年(1603)廷推沈鲤入阁，一贯惧怕失去元辅之位，对鲤颇存戒心，两相之间遂生隙怨。先是是年二月，楚藩宗人华越诬奏楚王华奎为异姓假王，诈袭爵位，沈一贯以“宫闱暧昧”，不欲发其事。而沈鲤一党之礼部侍郎郭正域则支持华越，疏请行勘，并欲藉此事将一贯逐出内阁。后抚按勘查，皆言事无佐证，神宗遂置而不问。

郭正域的行动引起浙党的强烈反弹，沈一贯指使党羽，将正域弹劾去官，并将矛头直指沈鲤。此时出现的“妖书”之狱，为这场党争推波助澜，使斗争呈现白热化状态。

所谓“妖书”，乃是一份关于太子之争的数页薄册，名为《国本攸关》，又名《续忧危议》。万历三十一年(1603)十一月，是书在北京城中秘密传播，“一夕间自宫门以迄衙门皆遍”(《幸存录》卷上《门户杂志》)。其文假借郑福成之答问，指责郑贵妃欲废太子，谋立己出之福王，书中并罗织拥戴福王之大臣名单，肆意诋毁。阁臣沈一贯、朱赓皆在其中。神宗获知后勃然震怒，下令东厂、锦衣卫及五城巡捕衙门严缉制作妖书之人。一时缇骑四出，人心惶惶。

由于沈一贯等人被列入妖书，故浙党怀疑此举为沈鲤、郭正域一党之所为。于是阴谋利用此案大做文章，报复沈鲤。

萧大亨时任刑部，主持“妖书”一案的审理。其亦与沈鲤关系不睦，遂在狱中秉承沈一贯之意，罗织罪

状,株连鲤与正域。

时以作书嫌疑被捕者,有著名僧人达观。又有同知胡化告发妖书“出教官阮明卿手”,两人俱下狱。萧大亨奉旨拷讯,皆不承。寻以胡化与郭正域为同乡,大亨“因导之引郭正域及归德——归德,(沈)鲤邑名。——化大呼曰:‘明卿,我仇也,故讐之。正域举进士,二十年不通问,何由同作妖书?我亦不知谁为归德者。’”(《明通鉴》卷七十三)

在审讯另一名嫌疑人皎生光时,萧大亨又再三诱令扳扯“同谋、主使之入”,生光不为所动。会审中,萧大亨递密笺于刑部主事王述古,命于爰书(纪录囚犯口供的文书)中脱皎生光而归罪郭正域,述古抵其稿于地,曰:“狱情不出囚口,出袖中乎?”(《罪惟录》传卷一一下《郭正域》)大亨只得作罢。

“妖书”案久久无法破获,礼臣李廷机、御史沈裕以狱无主名,恐辗转攀累无已,都要求以皎生光具狱结案。惟萧大亨心存疑虑,曰:“脱他日获有真犯,谁当其辜?”(《光宗实录》卷一)李、沈皆表示愿以身任之。在这种情况下,便由萧大亨领衔具奏,将皎生光诛杀,了结了这一场沸沸扬扬的“葫芦案”。

其实皎生光不过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撰作此书者,非熟悉宫廷内幕者莫属,不过从掌握的史料看,无论沈鲤或郭正域都没有撰写“妖书”的可能(据时人文秉《先拔志始》推则,撰书者可能是中书舍人赵士桢)。萧大亨极力扳扯二人,只是出于迎合沈一贯的党争需要,而非确有实据。此点已为时人所洞悉,谓“四明(一贯)与归德(鲤)相左,会妖书事起,遂贻其党论之”(伍先萃《林居漫录·别集》卷一);又谓“妖书案,辅臣沈一贯授意刑部尚书萧大亨……榜治胡化”(顾岑《三朝大议录》)。可见萧大亨利用大狱陷害政敌的行动,在当时便暴露无余。

乙巳“京察”:万历党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历届“京察”。所谓京察,即对两京各部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,每六年举行一次,例在巳、亥之岁。朝廷中各派政治势力为了保持各自的利益,都拼命抓察典,于是每届京察,皆成为党议的焦点和各方势力消长的机会。

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岁次乙巳,又逢京察之期,沈一贯、沈鲤两大派系围绕察典主持大权展开角逐,一贯首先策划阻止吏部左侍郎杨时乔主计典(自万历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七年四月,吏部不置尚书,杨时乔以侍郎署部事),拟由兵部尚书萧大亨来主其事。这一提议因遭到沈鲤坚决反对而废止,北京察典遂由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。及计典上,依附浙党的钱梦皋等人皆在贬窜之列,沈一贯大怒,密言于神宗,将察疏留中不下。于是台谏交章论一贯,玄黄之衅益深。

明制:察典行时,四品以上官员皆须具疏自陈,听皇帝裁定去留。确定去留后,而居官行为不当即有“遗行”者,再由科道官纠劾,谓之“拾遗”。台谏官员基于对沈一贯专权的不满,遂借拾遗之机大举反击。是年二月,萧大亨等各自考察自陈乞罢,上命供职如故。三月,吏科、河南道于是以考察拾遗论劾萧大亨不职,应予罢免。以时之成例,被弹劾而列入拾遗的官员,一般很难获免,但此次大亨却得到神宗的挽留,报称:“萧大亨、邢玠有大功,且奉有明旨,岂宜论劾。……俱留用。”(《神宗实录》卷四〇七)五日后,萧大亨等各以留用,引疾乞罢,神宗命即出视事,毋得再辞。

六月,支持京察的东林党人、南浙江道御史朱吾弼不甘受挫,再上疏称拾遗大臣必不可容,被察科道必不可留,语及大亨。奏入不报。七月,萧大亨以吾弼之疏引疾乞罢,神宗再予慰留。乙巳京察中围绕萧大亨的风波,至此始告平息。

“冢宰”之争:吏部为六部之首,掌握着举朝之人事任免,地位十分重要。自万历三十一年(1603)冬吏部尚书(习称冢宰)李戴去职,神宗久悬其缺不补,由何人继主铨曹,成为当时党议双方的又一个论争焦点。

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首辅沈一贯与次辅沈鲤同时去职,内阁仅朱赓一人维持残局。萧大亨与朱赓深相交许,入秉铨部的可能性很大。廷臣数次推戴冢宰,皆以大亨为首。虽然神宗未作点发,但随着万历三十五年(1607)“外察”之期的迫近,萧大亨出任冢宰的呼声日高,史称:“吏部缺尚书,三年屡推不点,外廷疑上欲临时点用大亨。”(《神宗实录》卷四二八)这引起反对势力的惊恐不安,随着吏部尚书的催点,一场围攻萧大亨的运动又日渐兴起。

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反对朱赓内阁的干将、户科给事中汪若霖首先以边吏媚敌、京军虚冒为由对萧大亨进行弹劾。次年正月,户科给事中沈凤翔、户部主事田一并又对大亨迭加举劾。萧大亨被弹后累疏求去,吏部议留,若霖又力诋部议,称:“大亨以干干物议,再疏乞休,吏部职司澄汰,奈何满纸绸缪,以荧上听。”三月,御史冯奕坦又揭发萧大亨曾收受播酋杨应龙婿宋承恩七千金,诡法开释,大亨疏辩其劾事属子虚,神宗皆不问。九月,给事中沈凤翔以吏部催请廷推一疏,大亨尚哀然首列,遂论其“屡挂弹章,经年注籍,而以公家大务倚办于私门,此必非政体所宜者”。并谓:“铨曹何地,太宰何官,而欲俾若等几倖,岂所以肃官常而息群喙哉?”(《神宗实录》卷四二五)萧大亨又上疏力请解官,不允。十二月,兵科给事中吕光耀又敷陈计事,指摘大亨甚

激。以至一时人言汹汹。辅臣朱赓不得不出面奏请,恳望神宗能就冢卿人选予以澄清。其称:“大亨求去,而科臣为之劝驾,大臣去留,取自圣裁,惟是道路讹传,听闻可骇。夫皇上所以屡留大亨者,止为大亨老成练达,熟谙边务,本兵不可无此人,非欲用之于吏部也。而天下固不能无疑。今惟求皇上速点一精明端亮、人心共服之人,使任冢宰,以主大计。于大亨或念其练习兵务,仍留本兵;或悯其情词真切,曲全大体,则舆情自服矣。”(《神宗实录》卷四二八)但神宗对此议置之不理。由于圣意难测,众臣对萧大亨的抨击仍未中止。

万历三十六年(1608)七月,因此前吏部侍郎杨时乔力请简用尚书,至是将廷推萧大亨与南京兵尚孙矿为两京冢宰。于是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又劾萧、孙二人俱不堪预推,疏中论大亨“筦枢日久,贪声大著,以致边事废弛决裂”(《万历邸钞》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)。并言兵部职方郎中申用懋为大亨谋主,太常少卿唐鹤征为矿谋主,亦当斥。九月,王元翰又以灾异屡现,请亟罢辅臣朱赓及枢臣萧大亨。十月、十一月,御史史记事、刘光复、科臣张凤彩、杜士全又先后对大亨进行弹劾。这场由廷推冢宰而产生的党争大波,直到本年底萧大亨致仕始告平息。

万历中期之党议,是以浙党与反浙党的斗争为主线,反浙阵营中,其中一部分又为东林党人。因此有必要在此一说萧大亨与东林党的关系。

东林党是当时在野之士大夫逐渐形成的一个松散的反党派政治集团,在万历中后期,其党围绕国本、言路、矿税、宦官、辽事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斗争。这些斗争中不乏含有进步意义的论争,但也多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自我内耗及毫无意义的义理之争。萧大亨与东林党的政治主张有同有异,其关系较为复杂。

因东林不仅是一个松弛的政治集团,同时还是一个理学流派,故其政治主张很大程度上是从理学着眼。而与之相比,萧大亨之施政更多是从现实着眼,反对冒进,务求持重。因之其与一味追求义理的东林官员在诸多问题上论争甚烈。另一方面,萧氏在政治中多依附于沈一贯、朱赓等人,故频遭浙党之反对派的指责,其中数劾大亨之王元翰、汪若霖、史记事等都是名列东林党的重要干将(但亦有反东林之大臣,如刘光复,即为东林党魁李三才的政敌)。然在反对宦官干政、反对矿税以及争立国本这几项具体问题上,萧大亨又与东林党人的主张十分接近。如萧之劾高淮,便与东林相呼应。

由于东林党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派系,其内部意见也多有分歧,因而对萧大亨之态度也各不一致。如万历三十三年(1605)在议留萧大亨问题上,同属东林党的杨时乔与汪若霖等发生激烈争执,杨时乔在覆奏中称:“大亨夙负才猷,效忠竭力,且边务方殷,一日枢臣尽缺,不当听去。”若霖力诋部议。田一并并斥杨时乔与萧大亨为一党。为东林尊崇的元老王家屏,对萧大亨深相推重,已屡见前述。东林党人冯琦与大亨关系友好,曾在考满“给由”问题上为萧竭力相争(《宗伯集》卷五十四《为直陈大臣考满始末以祈圣鉴…疏》)。宋焘与大亨不仅为同乡,两家且有连姻之谊(据《泰山宋氏族谱》:焘子之尤,娶大亨长子和中之女);公胤在大亨卒后,为撰行状,对其政绩多予肯定。凡此种种,不仅说明当时政治斗争之复杂,亦可见东林内部政见亦不尽一致,很难作统一画线。

上述诸多党争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有是非曲直之分,但更多的情况却都是基于门户之见、一己之利,而施行的政治报复。由于众臣皆把注意力从国家大事转移到门户之见上,很多是非因门户之见而颠倒、混淆,诸多要务因党派之争而搁置、延误,这是造成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。晚明学者夏允彝在反思这段历史时,曾深有感慨地言道:“两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,……东林之持论高,而于筹虜制寇卒无实著;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,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,徒以伎刻,可谓之聚怨,而不可谓之任怨也。其无济国,则两者同之耳。”(《幸存录》卷上《门户大略》)虽然夏氏此语主要是对万历晚期及泰昌、天启两朝东林与齐楚浙党混战之状况而论,但遂之以评萧大亨时代之党争,亦未尝不可。所谓党争误国,两派皆不可谓无罪,确为痛定思痛之言。萧大亨在立朝之十余年内,始终陷于这股浊流而不能自拔,并且推波助澜,加剧了党争之焰,诚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憾事!

## 五、最后的岁月

时序流转,弹指已是万历三十六年(1608),岁次戊申,此时距萧大亨之“束发登朝”已有四十七个年头,当年的少壮书生,而今已是古稀衰翁。对于永无休止的廷争党议,萧大亨已深感厌倦,其时时魂梦所系的,乃是故乡的云山烟水。风晨月夕,频生倦鸟知还、狐恋首丘之感。

早在上年,萧大亨便连疏请求致仕,至三十余上,但神宗执意不允。大学士朱赓以萧疏“辞情真恳”,乃代为陈乞,帝亦不报。

上年十一月,萧大亨的少年好友、乡试同年于慎行卒于东阁大学士任上,萧大亨闻讯悲悼不已,其殓也,亲视含饭。及殓,复日来探视。本年二月,于氏灵柩发于京师,大亨送至远郊,并赠百金,遣材官护送至其乡东

阿。故交零落,旧雨晨星,益发触引了萧大亨叶落归根的思绪。

本年十一月,萧大亨终于获准致仕。明神宗特优诏褒美,并赐驰驿归里。

萧大亨的传车又在京师至泰安的驿道上缓缓行进。四十年前,萧氏便是由此驿路入京应试的;四十年后,漫漫驿路又迎回了已是光禄大夫、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的萧公。

泰安州渐行渐近,远方的天际已显露出泰岱的一角青苍,阔别故里已有三十七载之久的萧大亨,心中怎能不涌现出无限的慨慨呢?他一生的主要时日虽然都在周旋边圉、握算枢庭之中度过,但却也有许许多多的回忆,同故乡有着密切的关系啊!

在泰山东麓的摩天岭下,埋葬着大亨的父亲萧乾和祖父萧胜,箭竿峪之水萦回于林墓之侧(按《泰山道里记》:“箭竿峪水南流经虎山北,又东南绕明尚书萧大亨先茔侧,汇为石马湾。”)。初萧乾之卒,大亨年仅十五,而丧葬皆如礼。及其母王氏病逝,大亨时正允准归养,驰驱于归乡途中,五百里外闻母讣,乃披跣不食,徒步日奔百里而归,庐墓于此,哀毁骨立。而今逝者如斯,惟松柏不凋,故山依然。萧大亨在垂暮之年能全节还山,在垄头一奠麦饭,也许在死者与生者间都能带来无上的慰藉。

在泰山西麓的凌汉峰下,还有一处被萧大亨称为“旧游胜地”的三阳庵。嘉靖三十年(1551),东平道士王三阳与其徒管复明在凌汉峰修真,后遂以其地为庵。其处“磴道崎岖,林木葱茂,殿宇亭榭,悉皆委巷。俯观下界,满目山河,另一奇幻”(《泰山小史·三阳庵》)。萧大亨少与管复明有交,隆庆四年(1570),曾应宪台朱衡之命,为撰《建立三阳庵记》。此后,万历二十三年(1595),管复明复于庵中增建门阁,再请萧公为记。萧大亨又为撰《三阳观新建门阁记》,对管炼师断崖斩石,辛苦劳作,使荒榛灌莽之区化为丹台紫府之开拓精神甚致钦慕。

萧大亨与当时另一位泰山名道柴麓庵亦有交契。万历初年,柴氏修炼于摩天岭南之屏风岩,建庵居之,曰四阳,一名潜仙。萧大亨以其院址不敞,移庵于旧基东北,形胜较旧有加,道众于其处立“第一代开山大檀越萧公”之碑,以志其开辟道场之善迹。此外萧大亨还曾重修奈河西岸之清虚观、城南之观音堂及岱阴的碧峰寺。

故里的人文风物,无不萧大亨深深眷爱,以至报有“每欲稽之载籍,询之老成”,撰写一部泰安方志的宏愿。但这一构想,终因他长期束于职事而未遑实施。当万历三十一年(1603)泰安知州任弘烈修成《泰安州志》后,萧大亨不禁欣喜万端,亲为其书题序。其在文中称:“然则(任)侯之创为斯志也,宁诂修故事、资览观而已夫?亦以示劝惩之义,兴绍述之思,范俗维风,将于是在,侯其大有造于此邦者哉。抑汉人称天下之安,若泰山而四维之,我国家以泰安名州,不为无意。维是赫赫巨灵,实长群岳,泰岱安则四岳之神举安。五岳莫安,斯海内无弗安者。顾名思义,所为协和神人,以绥四国者,且当自吾州始。而斯志之作,又岂区区一方文献所系尔也。余故为论次如此。若夫雄奇峻绝之观,环玮钜灵之彩,海内业修言之,要足使山灵生色,而未足为民社增重,鲁邦所瞻,或者更有在焉。”

——序中“天下之安”诸语,出自汉代淮南王之《上书谏伐南越》文。淮南王刘安上武帝疏中称:“陛下以四海为境,生民之属,皆为臣妾,垂德惠以覆露之,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,则泽被万世,传之子孙,施之无穷,天下之安,犹泰山而四维之也(维:结物之大绳。四维象征能使事物固定下来之力量)。”(见《汉书·严助传》及《全汉文》卷十二)萧序即引申此意。而萧大亨目光所在,尤重在一“安”字。“安”含有治理得宜,能使黎民乐业,人神俱安之意(《后汉书·左雄传》云:“安人则惠,黎民怀之”)。如果摒除其中神化泰山的内容,则萧大亨劝勉任弘烈致力于泰岳民社之安的这番说词,仍是与其壮年出守时之务实思想一脉相承。

萧大亨在开府柄枢之数十年中,虽身总繁剧,但仍倦倦系心于故里之建设。旧时省郡县学,皆设有尊经阁,用以珍藏历代御赐书籍及各种经典,意表尊崇经术,并以此训课士子。泰安庙学因资金缺乏,未建尊经阁,大亨闻其阙状,乃于敬一亭旧址捐资饬材,构阁五楹,后复遣其子萧和中返里督建,至万历三十一年(1603),阁遂落成。此为泰安最早之公共图书馆。州中书籍缺乏,萧氏又广觅善本,翻版刷印,嘉惠来学,并亲自编订了《今古文钞》、《文章正宗》等书以授诸生。泰安徭役繁重,加之旱潦叠生,民不堪命,萧大亨因诉诸有司,为调剂徭役,折解役马。因此诸端,其声名流布乡里,被视为神明。万历后期,在泰安州城及莱芜、新泰等地,相继建起萧公生祠,表达对这位乡贤的崇敬之情。

寒风撼撼中,萧大亨的传车终于抵达泰安。脱离了宦海沉浮,重卧东山,自有一番鸢鱼之乐。吴道南在《萧公墓表》中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:

“公归里,由由于于,与乡里故老言辞色笑,宛然若平时,不减洛社、香山适也。”

里居期间,萧大亨足迹不践公庭,但遇到涉及兴革利弊的事端,亦不惮谆谆教诲,其言行被有司奉为楷模。

归里之后,萧大亨除了敬奠泰山祖茔之下,还要了却一桩长年未遂的积愿,这就是重归吉水祖籍,一谒先茔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)前后,萧大亨躬至吉水,扫墓之后,于吉水县城北坊修建青石浮雕牌坊一座,名曰“四

世一品”坊(时萧大亨已被追封三世,故云),乡人莫不引以为荣。

万历三十九年(1611)八月十七日,萧大亨夫人刘氏在家中病逝,享年八十。此时距两人结缡,已历六十个春秋。刘氏为人忠恕善良,夫妇关系良好,萧大亨居官近五十年,刘氏从官仅七载,余皆在乡操持家事,使萧大亨无内顾之忧。刘氏卒后,明廷曾遣山东按察使秦一鹏致祭,翌年二月,复应礼部之请,予刘氏祭葬。

根据萧大亨的意愿,将刘氏安葬于州城以西的金牛山下。这金牛山,大亨之子萧协中曾于《泰山小史》中叙其形胜云:“治西南三十余里,脉出泰山,环为拥护。徂(徕)、傲(徕)两山之外,挺立雄飞,惟金牛者。含烟凝翠,映日飘黄,则又诸山所不逮。”并系之以诗云:“一脉原从月观分,迢迢环拥泰山云。东凭徂嶺开青嶂,北枕徕峰倚翠簪。深岫鸟归蛩软韵,疏林烟挂绀斜曛。已知擅胜无双地,杖履频过瑞霭纷。”相传萧大亨发迹之前,尝为人佣工于此,见其地形胜,而有归骨斯山之思,及居官后,遂购置为莹田。此时当大亨再次凝望这青紫碧联、苍莽际天的金牛山色,想到自己不久后也将与夫人“共域于玄扃”,胸中定会浮现出万千的慨思。

萧大亨因早年久历塞上,素来体格强悍,虽年届古稀,而能兼摄两部,精力不衰。友人及同僚颇多以此见询者,萧大亨归乡后,因撰《养老奇书》,自叙其养生之道。然而,年过八十之后,萧大亨已自感体力不支,此时刘氏卜葬,大亨强力支撑往视其事。旋即缠绵病榻,萧府为延请了一位医术高明的云梦山程道士来泰为大亨疗病,但未能彻底好转。

转眼到了万历四十年(1612)壬子岁,在这新年元日,一只白鹤翩然降于萧府层檐之上,翔舞移时,才嘎然飞去。二十二天后,萧大亨在府第中溘然长逝。时人因先前白鹤之兆,皆以公为仙逝。至此,一代名臣萧大亨走完了他八十一年的人生旅程,他的美名及边塞、筑枢勋迹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。

萧大亨卒后,其长子萧和中驰书江南,向久已告老的前任首辅申时行求撰墓志。申时行与萧大亨不仅是同榜好友,而且政治立场基本相同,萧之去世,使申时行痛失知己,悲不自胜,特别是当他环顾时局,感此国步维艰之际,又失柱石,事益难为。因在志石中写下这样一段意味深长之语:“今海内幸无警,而边事尚多隐忧,安得起公于九原,与之决大疑、定大计,此余所以重为公悲也!”感愤之情,溢于言表。后辅臣吴道南又为萧公撰作墓表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)九月,明神宗以礼部请:“已故兵部尚书萧大亨累著边功,予祭葬如例,仍加祭一坛,开圻合葬。”(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五三七)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复应吏部尚书郑继之之请,追赠大亨为太傅。

为了筹画萧大亨之祭葬事宜,明廷遣太常寺少卿张文征至泰安主持其役。敕建之墓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八月竣工。墓占地面积约二千平方米,在长达六十米、宽六米的甬道上,依次排列着四柱三间歇山式石坊两座,前坊悬匾“救命”,题额“褒崇旷典”,“钦赠太傅兵刑两部尚书萧公佳城”;后坊悬匾“救命”,题额“茂膺天宠”,“钦赠太傅兵刑两部尚书萧公华表”。前后坊之间依次为华表二座及武士石像、石虎、石羊、石马。文臣石像各二。皆雕刻精细,物象生动。按明制:“功臣歿后封王,……(墓)石人四,文武各二,石虎、羊、马、石望柱各二;一品、二品石人二,文武各一,虎、羊、望柱各二。三品、四品无石人,五品无石虎,六品以下无。”萧大亨官爵仅至一品,但墓上石像生之規制却视同王爵,似为破例,于此亦可见明廷对其之推重。

民国间泰山学者李东辰《岱联拾遗》中曾记萧公墓旧观云:“治城西南三十里金牛山之阳,丘岭环抱,明太傅、兵刑两部尚书萧大亨岳峰与一品夫人刘氏合葬处也。孤冢如覆釜,无附葬者,高可三公尺,东南向。墓前丰碑有八,断路者六,吴道南撰书墓表及秦一鹏致祭刘氏碑今尚完整。前为华表石坊三栋,透刻谒墓图,武臣跨轻驹,文臣张华盖,精美无比;坊外为参道,对列文官、马、羊、虎、武将、华表各一对;最前为佳城石坊,横枋题‘褒崇旷典’四字,款署‘万历丙辰八月钦差太常寺少卿张文征建’。两柱刻正书联云:‘束发登朝,勋业久垂于边地;鞠躬尽节,忠勤益励于宣成。’”

——“鞠躬尽节”、“勋业久垂”,这便是明廷对萧大亨的盖棺论定。

萧大亨卒后不久,中国大地便发生了一场天崩地坼的变故。在这场历史巨变中,显赫一时的萧大亨家族也走到其末路。爰附叙于后,作为《萧传》之余音。

萧大亨生有二子一女,长子和中,夫人刘氏出;次子协中,如夫人庄氏出。萧和中以父荫入仕,历官后府(后军都督府)都事、工部都水司郎中,累进太仆寺少卿。方志本传称其“明达有为”,但在历史上并未留下显著政迹。

和中之弟协中,字公黼,乃是明末知名之泰山学者。协中天赋颖秀,自幼工于诗赋。所作“钜丽妍藻,类汉晋人手笔”(明·李维桢《酝檀集序》)。十八岁时即因作《绿远楼赋》而蜚声文坛,大学者李维桢曾对其加以称赏,比之“终子云”(西汉少年名臣终军)。协中以父荫入仕,历任上林苑监丞、顺天府(今北京)治中。当时正值明王朝崩溃的前夜,内忧外患重重。协中对此劳结万端,史称其“蒿目时事,辄扼腕歔嘘”(道光《泰安县志》·萧

协中传》)。他虽在政治上始终“未能一展其才”，但壮心不已。其在《舟中同徐灵哉(泰安文人)同社有怀》一诗中写道：

十年孤愤对黄河，风雨来时洗岸莎。此日乡违千里泪，平生耐在六朝歌。

渔舟落落天边渡，羌笛飘飘柳外过。杯酒仍堪悲壮业，江湖岂许一婆娑。

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协中在“风雨来时”不甘消沉的奋发胸怀。清人宋思仁曾指出：“先生(萧协中)之政事治绩不多概见，而即是集以观其议论风采，已可规夫清幽孤介之操矣！”(《泰山小史序》)

崇祯末年，萧协中致仕还乡，寓居泰安城醴园(故址在今泰城财源大街五金大楼附近)，吟诗纵酒，其在《秋兴》诗中描述：“高楼敞四面，俗色多徘徊。清怀堪傍竹，长歌且把杯。密楼鸣蝉聒，深池素鲤回。澄景看银汉，潇洒兴独开。”同时，他还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，时时“野袍山屐”、“竹杖芒鞋”，登山临水，濡墨抒怀。

萧协中著有《醴园集》、《泰山小史》等书，尤以《泰山小史》对后世影响为大。

《泰山小史》一书，“以名胜为纲，终之以人物。每题下列短文叙其崖略，词简意赅，系之以诗，歌行律绝，不拘一体，为山经之创格。诗境超逸，神与古会”(民国·赵新儒《泰山小史跋》)。全书共收录泰山名胜及名人共150余条，皆作题咏，并各系以小序。诗文中所写的泰山胜迹，无不生动传神，状写如画，读后使人“如卧青山白云之中”。而且书中记录的一些泰山史料(如半山亭秦篆)，对泰山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诗人吟咏山水之书中，往往还寓含了对家国衰微的叹惋和民间疾苦的同情。如《金殿》一诗及序，谓明室在岱顶铸造金殿之日，正“时值大(己)灾”，白骨沟渠，而统治者仍穷奢极欲，“锱珠以入，泥沙以出”。诗人咏道：“八宝世所珍，五金神不贵；玉女自清虚，安用重耗费。岁浮沟渠，蓬蓬乱如奔；民筑金楼，圣慈何所慰？”对皇室的暴行表示了强烈的愤慨。又如《谢过城》诗：“齐人夹谷能归过，千载犹存谢过城；今日军戎频玩寇，更无人可却莱兵！”则表达对家国命运的忧虑。《泰山小史》中这类作品虽为数不多，但却是作者思想上的精华所在。正如民国学者王澐在《题泰山小史绝句》中所咏叹到的：“名山事业诗成史，三百年来正气留。”用这两句诗概括萧协中的成就和人品，应当说是公允的。

和中之子友瀚、友贤，事迹皆无考。友贤之子启浚，号松庵，袭锦衣卫金书、管卫事。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三《圣驾巡城》中曾叙及其人，称其为“萧大亨之武荫”。今泰山关帝庙之东墙外尚存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萧启浚所立碑记。

就在萧启浚泰山立碑之际，震惊朝野的甲申事变发生，李自成挥师入京，宣告了明朝的灭亡。讯息传来，明泰安知州朱万钦仓皇弃官出逃。至是年四月，大顺泰安州牧史可保与防御史郭都相继到任，郭都令史可保将萧启浚与在乡之行人司行人赵弘文下狱拷掠，引起泰安官绅阶层的惶惧不安。五月三日，获释之赵弘文密结原任高唐游击高桂，纠集党徒百余人，于黎明时在泰城南门发动政变，杀死郭都及其部将十余人。第二天，大顺权将军郭升闻变，率军包围州城，三千余骑四面环攻。战斗极为激烈，“自巳至申(九时至十七时)，‘贼’(大顺军)为飞驳所伤者约五百人”(王度《伪官据城记》)。郭升屡攻不克之际，萧启浚为妻孥计，潜至北门，延大顺军登城，泰安遂破。萧协中时在城中，闻失守，北向再拜后，自投于城东南隅之井。是役泰安士绅死难者甚众，萧大亨夫人刘氏之侄诸生刘孔训，时亦率众守城，城破为大顺军所杀。

郭升破泰安后，将萧启浚与赵弘文逮捕，押送北行。行至博山，适逢大顺军败讯传来，郭部溃散，赵弘文乘机逃归，萧启浚则不知所终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年修《泰安县志》称其“死于流寇”，或于是时为乱兵所戕。

是年(1644)六月，清军挥戈进入山东，泰安遂入清之版图。在此后数年中，萧府大变迭起，至顺治四年(1647)而被清廷全面查抄。此事在正史方志皆付之阙如，难明其详，据民国泰山学者王次通先生研究，其祸主要是为萧启浚“延贼登城之罪”而发(说详《岱臆》)。萧大亨家族经此大劫，终陷于彻底破败。及百余年后，清泰安知府宋思仁见到萧氏后裔萧浚时，已是“式微已甚，贫困益急”，而有“栾、郤之后，降为皂隶”之叹(引者按：栾、栾叔；郤，郤芮；皆春秋晋国之世卿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述晋大夫叔向之言：“栾、郤、胥、原、狐、续、庆、伯，降在皂隶。”宋氏取意于此)。

清代康熙之际，泰安画家金简在所著《泰山图说》之“山城春晓”篇中悲慨地写道：

“神仙府内，萧司马之宦迹何存？”

据此可知，早在此时，泰安城中之司马府便已悄然易主。堂榭犹在，主人已非。在此后三百年的历史变迁中，有关萧大亨的众多遗迹更相继化为尘埃，无从凭吊。只有金牛山下的一抔丘垄，在硝烟与流光中幸存。翁仲依旧，石马无言，犹似在追忆这位历史上毁誉不一的一代重臣。

(续完)

(作者单位：泰安师专图书馆)